

生命力的激发 :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

——孙中山民主思想的启示

雒新艳^{1 2}

(1.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8;2.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引领我国当前社会生活实际效力上有弱化趋势,通过对孙中山民主思想的透视可探寻其原因。虽然孙中山民主思想对西方民主理论有创造性的发挥,但是无法掩饰其弱点:它没有充分考虑到理论受众体的社会实力和对理论本身的接受能力,造成理论与物质基础相脱离;它对理论内容和理论宣传形式没有很好地进行本土化改造,造成理论与实践相脱离。这些不足印证并启迪了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在于生命力的激发,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植根于群众利益的深厚土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方式和宣传途径必须贴近群众;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具有无限延展的品质。

关键词:弱化;物质基础;生命力;群众利益;宣传方式;延展

中图分类号: D0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12)01-0019-04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就成为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长期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自然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所谓主流意识形态,是指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思想理论体系,反映着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并为其服务。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 38}。除此之外,存在于社会不同阶层和利益群众中不占统治地位,未被其他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接受和认可的理论体系,即为非主流意识形态。

从内涵上看,主流意识形态就是该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一般而言,它就是该社会的指导思想。但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主流意识形态也可能出现地位与功能的背离,导致其在对民众生活的实际引领效力上呈现弱化趋势。我们当然可以从不同视角对其原因进行探究。南京大学姜迎春教授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综论》一书中曾指出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弱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主流意识形态赖以生长的社会土壤发生改变。具体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现代市民社会中个体价值被视为至上的价值”^{[2] 7},而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社会理想则被视为

乌托邦。二是现代市民社会中对金钱的崇拜导致文化价值的物化,而这种“物化与量化导致了人们精神世界的空虚化”^{[2] 7}。

本文则试图转换视角,通过对孙中山民主思想的剖析针砭理论不足,理论和物质基础、群众利益以及实践方式相脱离。这恰好印证了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弱化的另一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群众基础、宣传方式有所偏离,理论本身的无限延展品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此,作者建议性地提出扭转这一局面的关键,即重新激发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一、孙中山民主思想是西方民主理论的承继与发展

孙中山民主思想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处于救亡图存关键时期,在同维新派、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的斗争中产生并形成的。

孙中山明确指出中华民族的出路在于推翻封建帝制,仿效西方民主理念建立起自己的民主政府,即“以人群自治为政府之极”。在孙中山看来,达成这一目标的方式和途径只能是通过暴力,因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

收稿日期:2011-12-02

基金项目:河海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9430311)

作者简介:雒新艳(1974—),女,山西方山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不能易位^{〔3〕2-53}。为此,他不遗余力奔走于各地。仅1907年5月至1908年5月,他就组织和领导了西南边境的六次反清武装起事。尽管起事失败,但是孙中山仍然坚持自己的武装夺取政权思想和原则,直到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

正是在艰难的革命实践中,孙中山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决心日益坚定。特别是当辛亥革命的成果面临威胁,当他听到“复开君宪”和“非袁莫属”等舆论时,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未来感到无比忧虑,再三强调“要建立共和政府的制度”,要让中国人民“选择自己的代表来管理自己的事务”,要“为人民自己最高的利益而工作^{〔4〕}”。在以他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努力下,以“三民主义”为建国理念的“中华民国”终于成立。

此后,孙中山更是在承继西方民主理论基础上形成自己富有创造性的民主思想。首先,他吸收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和批判继承中国古代任用官员的考试、监察制度的合理因素,在此基础上完善了“五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设想。五权分立即五权宪法。其指导思想是由国民掌握“政权”,“政府实施”治权”。孙中山看到西方代议制的弊端,即人民不能直接行使权力,实际上人民根本管不了政府。五权宪法的核心就是要使政权与治权分开却又互相制约。第一,政权属于人民,政府依民意发挥职能。人民执掌权力直接去管理国事、管理政治、管理政府,政府则要通过考试,把有真才实干的人才选拔出来。这些人既有本领,又能忠心为国家做事,国家大权方可托付于他们。其次,孙中山根据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具体国情,提出了各民族团结的“五族共和”原则。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曾多次申明:“五族共和”是立国基本原则之一,目的在于达到中华民族的统一。他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3〕2}”,对外则须“持平和主义,与我友邦益增亲睦,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3〕3}”。可见,“五族共和”思想包含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第一,在建设统一的新国家基础上,各民族平等、团结和统一;第二,民族团结是以人民主权为灵魂的各族人民的民主大团结;第三,在国家、民族独立的原则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自主,与各国各民族友好亲睦,反对媚外辱国和盲目排外。

总之,孙中山民主思想是对西方民主理论的直接继承,亦有所发展。其核心和灵魂就是涵盖上述内容的“三民主义”,简称为“民族、民权、民生”。

二、理论与群众基础、实践方式相脱离是孙中山民主思想的弱点

尽管孙中山先生为此宏愿励精图治,却终究无

法使“三民主义”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中华民国”也在后来的治国实践中逐渐偏离其理念。笔者以为这种局面根源于孙中山民主思想的两大弱点:

1. 没有充分考虑到理论受众体的社会实力和对理论本身的接受能力,造成理论与物质基础相脱离

长期以来,中国以农业生产作为自己的主要社会经济,政治上长期实行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与此相对应传统社会也形成了特有的血缘宗法关系建构模式以及与上述社会基础相适应的重尊卑、强秩序、论等级的思想文化传统。这样的经济政治基础和意识形态运行彼此协调圆融。

这种圆融被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殖民统治打破。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打破是世界历史前行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说过:“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276}。从此,“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1〕276-277}”。

正是伴随着半殖民化的进程,中国艰难地开始了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到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组织模式已发生重大改变。例如,工业生产在整个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机器动力和工具不仅影响和改变着工业生产结构,也影响甚至冲击着传统的农业生产结构和方式,许多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城市人口急增,家庭规模逐渐缩小,家庭结构日趋简单,社会成员的可流动性极大提升。

但是这样的改变不能说明中国社会已经拥有构建西方民主理论的社会土壤。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其一,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力量薄弱,导致“三民主义”缺乏物质基础和群众土壤。西方民主理论的前提是资产阶级已经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或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工业无产者从数量到内涵也足以担当革命主力并且和资产阶级共同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而19世纪上半期的中国,虽然工业生产在社会生产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民族工商业有了一定规模,但一则它并未完全取代农业的主导地位,农民仍然是我国社会成员的主体;二则我国的工业生产从起步之日就具有很强的依附性,或者依附于官吏集团,或者依附于外国势力。因此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力量均很薄弱,导致他们无法支撑起孙中山所设想的“三民主义”这一全新理念运行所需要的全部机构和制度。其二,除产业工人之外,中国民主理论的重要理论受众体应该是农民,“三民主义”却没有把他们吸收进来。长期以来农民始终是中国社会和一切事业的主力,中国的民主事

业必须唤醒农民意识,让他们充分了解“三民主义”的内涵和意义,自觉地支持它、践行它。遗憾的是,“三民主义”更多地把自己的理论受众对象局限为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所以在理论解读、理论宣传以及理论实践上没有考虑农民和其他下层群众的利益需求、认知水平和文化习惯,导致这一理论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都无法契合他们的需求、激起他们的共鸣。因此,尽管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设计出非常美好的民主政治理念,也为实现这一理论前仆后继,却终因它们过于阳春白雪而丧失其社会土壤和群众基础。

2. 对理论内容和理论宣传形式没有很好地进行本土化改造,造成理论与实践相脱离

虽然孙中山先生在继承西方民主思想基础上,合理吸收传统文化精华,试图建构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思想和理论,但是囿于知识分子的阶级立场和情怀,他始终没有真正认清中国国情,即农民才是成就中国社会一切事业的深厚土壤和群众基础。所以无论是内容还是宣传形式,“三民主义”都没有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利益需要、情感体验和价值认同,致使其理论影响力基本停留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广大知识分子层面。例如,孙中山先生的理论表达方式非常文雅和工整,却过于学术化与理论化,并且缺乏有效的宣传途径,因此无法最大程度地激发群众的心灵共鸣与拥护。

相反,毛泽东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时充分考虑此因素,很好地完成了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和民族化改造。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再好也是植根于欧洲社会经济政治土壤和国际社会背景的产物,如果简单移植就想让它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那是不可能的。只有结合中国实际对其进行合理改造,培育出它扎根中国社会生命之根并且适当施肥与浇水,才能使其很好地生存下来。因此,毛泽东从以下3方面探索了马克思主义与本土资源的融合:第一,毛泽东非常尊重农民等下层群众的利益诉求,通过分割地主土地给农民耕种、给解放区农民减租减息等措施,让他们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无产阶级立场,扩大和深化了理论的群众基础。第二,毛泽东制定了适合中国本土的革命策略和方针,提出“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农村包围城市”这“三大法宝”,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大地扎根。第三,毛泽东把这些思想以适合农民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语言介绍给他们,而且多以农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传达,加快了它与农民生活的水乳交融。例如,陕北的秧歌、山东的快书、各地的戏曲等都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有效途径和手段。所以,马克思主义才能随着

中国社会的前行蓬勃发展。

可见,西方民主政治能够完美运行是与其深厚的社会土壤和完善的实施环节分不开的,我们学习和借鉴它,必须充分考虑本国国情,很好地消化并且建立起切实可行的运作机制和环境。否则,再完美的外来理论都无法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

三、激发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是我国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曾经非常深入人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展示出极强凝聚力的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21世纪的今天却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地位和效应的背离,即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的实际引领效力上出现弱化趋势。换言之,当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凝聚力、民众的价值认同度上相对软弱。根源何在?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孙中山民主理论表现出的弊端以及毛泽东本土化的成功经验给它作了最好注解,指明我国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就是最大程度激发马克思主义生命力。

1. 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植根于群众利益的深厚土壤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本土化、民族化改造,根本原因在于它满足了农民、工人等下层群众的利益,为自己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21世纪的今天,被历史选择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却日益疏离了群众的利益诉求,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自己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

当前我国的阶层状况如何,我国的群众到底包含哪些成分?笔者采用了当前学界较为有影响力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的划分方法。本课题组依据对社会经济资源、政治资源以及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将我国的社会成员分为十个阶层,从高到低依次为: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这10个阶层中,前4个阶层对社会资源的占有量较多,后6个阶层的占有量相对较少,尤其是最后3个阶层的占有量几乎属于赤贫。

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考虑到这些阶层的利益需求,运用手中的权力资源适当分配、合理调适以及平衡协调他们之间的利益,并使这些利益最大程度地实现。但是传统的官僚机制和官僚意识总是使主流意识形态的某些代表者和执行者把公共权力转变为实现自己私利的工具,造成了主流

意识形态理论与其群众基础的错位。

对此,西方社会普遍认为中国在当前的社会运行机制下无法彻底解决上述问题,除非中国改变共产党一党执政、真正建立起权力的分离与制衡原则。这种主张已经在中国社会的实际运行中被历史地扬弃,但是它提供的基本原则是合理的。第一,必须彻底纠正官僚机制的弊端,使国家政策和法规切实建立在上述阶层利益基础之上。第二,必须引进党外监督机制和民主监督机制,使执行者不能以权谋私。第三,必须加快法制进程,特别是法治向度的完整性和彻底性,即不仅面向普通百姓,更要面向政治上层建筑机构成员。惟其如此,主流意识形态才能真正植根于深厚的社会土壤,拥有扎实的群众基础,其生命力才能被激发。

2.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方式和途径必须贴近群众

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除了要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之外,还需设计出能够很好表达它的形式,即宣传方式和宣传途径。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虽然内容决定形式,但是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对内容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如前所述,毛泽东率先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之一,就是他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群众化。他把这一理论以适合农民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语言介绍给他们,而且多以农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传达给他们。这就说明,在中国农民喜欢的语言和艺术部类才是最好宣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途径,而看似最平易近人和朴实直白的形式才是最好的表达方式。

我们当前的意识形态宣传机构,不要以为只有把意识形态捧得高高在上,并且用严肃的政治化语言才能达到宣传效果。事实相反,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弱化的重要表现正是宣传部门看似强势而席卷全国的口号式表达与它对百姓而言空洞、教条与虚化感受之间的困境。所以,我们必须改变思路,以看似平实、贴近百姓生活和实际需要的语言和宣传形式代替它,效果应该更理想。古语说得好: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不要让本来可以很好充当百姓精神指南和思想粘胶的马克思主义丧失其应有的价值凝聚和引领功能。

3. 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具有无限延展的品质

上述主张和要求能否实现,关键在于上升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否仍然保持着无限延展的理论品质,这也是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命力能否被激发出来的基本保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特质就是满载生命力的批判性和革命性。革命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很好地诠释和展示了它。

西方学者认为这一品质到现在已全面消解,所以才出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尴尬处境。保守主义理论家大都主张:一种理论一旦上升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其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必然从革命退化为保守。因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自然丧失其批判性而变得保守,理论也难免不断萎缩。

这一观点有其合理性,即马克思主义确实从一般意识上升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也确实承担着维持现存秩序和现有统治的使命。但是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质上不同:前者即使作为意识形态也不会把历史终结到当下,它要求当前的积极建设是为了最终超越自己,把历史推向更高的理想状态;后者则要求历史终结到资本主义时代。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是“深刻揭示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客规律先进理论的,是致力于共产主义社会远大目标的实践理性方式的学说”^[5]。

共产主义价值取向正是马克思主义保持批判性和革命性的生命所在。马克思曾说过:“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仅仅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也不仅仅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1]37}。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发扬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积极的理论品质,牢记这种保守只是一种暂时状态,不断把现实推向更高的理想状态才是其永恒历史使命。邓小平早就告诉我们,当前只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实现共产主义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我们这些人的脑子里是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而且还要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6]。只有共产主义的远大胸怀不被丢弃,马克思主义才能继续充当我国社会生活价值引领的角色。

总之,批判性和革命性这一理论品质的强化、理论对群众利益需求的不断满足、理论宣传途径与方式和群众认知与审美的自觉契合构成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生命力绽放的三大要件。它们的整体性达成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弱化的趋势。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姜迎春.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综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 [3] 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4] 翦伯赞.史料与史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328.
- [5] 胡华强.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本质[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3(4):9-12.
- [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1.